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8.02.022

复古抑或创新:基于内容的外语教学(CBI)

——从洋务学堂的外语课程教学谈起

彭珊¹, 方宗祥²

(1.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2. 南京邮电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教学实践被认为是中国正规外语教学的开端。通过对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相关教学要素及特点的分析,发现其与“基于内容的语言教学”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洋务运动虽然在政治意义上以失败告终,但作为外语教学发展史的一环,这一时期的外语实践仍旧能给今天的外语教学提供诸多启示。

关键词:基于内容的外语教学(CBI);洋务运动;洋务学堂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8)02-0099-04

1 问题的提出

“基于内容的语言教学”即 Content - Based Instruction(CBI),也被称为“依托内容的语言教学”。它指在教学中将外语视为目标语,并以之为媒介来学习其他科目知识,使外语和专业知识同时增长的教学观念。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CBI在世界各地的EFL教学中备受青睐。学术界一般认为CBI起源于196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沉浸式”教学实验(Immersion Program)。国内也一般认为我国的CBI教学始于1980年代的中外合作办学中。然而,早在一个半世纪前,清政府为应对鸦片战争后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发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开设的各类学堂中设置了外语、自然、科技类课程。其中,外语不但是必修科目,也普遍是科学技术类课程的教学语言,不难发现,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形式从本质上体现出了诸多“基于内容的外语教学”(CBI)的特征。

那么,洋务学堂是如何进行外语教学,又与CBI有哪些共同处?洋务运动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CBI在中国到底是一种创新思想还是复古潮流?它能给当今的CBI提供哪些启示?这

些都将是本文着力探讨的内容。

2 洋务学堂的外语课程教学

2.1 外语学堂的教学

开设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外语学校。以其为例,最初命上海、广州的地方官进行推荐英法文教师,并令其“携带各国书籍来京”^{[1]273},最终敲定包尔腾(J. S. Burdon)和司默灵(A. E. Smorrenberg)分别为英文、法文教师。后京师同文馆又增设了天文算学馆,并“延聘西人在馆教授”,于是馆中正式开始用外语教授其他西方近代课程。当美国的丁韪良(Dr. W. A. P. Martin)任同文馆总教习时,他将同文馆的学制设定为五年制和八年制,对于五年制的学生,“谨借译本而求诸学”,而八年制的学生先学外语,从第四年开始“由洋文而及诸学”^{[2]27-36},即用外语学习数学、物理、几何、化学、地理等自然技术课程。由此可见,京师同文馆中八年制的学生不仅主修外语,也已经开始借外语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课程了。

2.2 军事学堂的外语教学

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代表的军事学堂主要培养

船舰设计、制造、驾驶的人才,自1867年开办后,福州船政学堂就先后聘请外国专业技师来辅导学生的船务水平学习,如法国人德克碑(D' Aiguebelle)和日意格(Giquel, Prosper Marie)。福州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用法文作教学语言,学习法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机械学等,也叫“法文学堂”;后学堂用英文进行教学,学习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航海天文学、航海理论等,也叫“英文学堂”。另外,学生还须在外籍教师的监督下完成船上和车间的演练和实习。福州船政学堂采取外国外语训练与专业知识学习同时并进的方针。外语被视为一种必须掌握的工具,学习它是为了“登堂入室”更好地直接汲取西学知识^[2]。船政学堂学生学成后也开始承揽船舶的设计及技术方面的工作,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海防和造船工业本土化和独立发展的进程。

2.3 实业技术类学堂的外语教学

19世纪70年代末,洋务派兴办了一大批铁路、电报、医学、矿务类实业技术学堂。福州电报学堂的外籍教师是从丹麦大北公司请来的工程师,电报专业教学器材也由丹麦引进。而学生由来自有英语基础的广州、香港等城市或是船政学堂里有外语、数学知识的学生组成,这为外籍教师直接用英语教授电报知识提供了语言支持。而后,天津电报学堂同样聘请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技术人员用英语来教授电学和发报技术,并规定只有英语熟练的学生才能获得入学资格。具备一定的外语基础的电报学堂学生在外籍教师的指导下,各项功课基本通晓,福州电报学堂在开办一年后也取得非常理想的成绩。1889年,广东设立的西艺学堂聘请了赫尔伯特、葛路模、骆丙生、巴庚生等外籍教师。其中巴庚生“铜铁锡矿学、化学皆精”,又是经验丰富的“开矿有效”者^[1]。这也说明,实业技术学堂外籍教师的专业性和实践性是值得肯定的。

3 CBI在洋务学堂外语教学中的体现

一般认为,CBI在我国的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Leaver和Stryker总结了CBI的4个特征:基于主题内容;运用地道的教材;学习新知识和照顾特别学生群的需求^[3]。CBI是指一种将目标语视为媒介来教授其他科目的方法,那么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CBI就存在于中国的教学设置中了^[4]¹¹¹⁻¹¹⁶。

同时,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也已经体现出诸多CBI教学观念的特征。下面,本文将从教学相关要素的角度阐述洋务学堂外语教学的CBI特征。

3.1 教学模式

洋务学堂的外语学堂、军事学堂和实业技术学堂先后将外语视为学习其他专业科目知识的媒介。比如京师同文馆的八年制课表中要求中高年级学生,英语外语训练寓于科学知识的教学之中^[5]。美国的丁魁良、满乐道,爱尔兰的欧礼斐,中国的汪凤藻等人都曾用英文教授过专业课程;福州船政学堂也用英语和法语教授船舶建造和设计的相关内容。这种“由洋文而及诸学”的培养模式,是学生以洋文学习为基础,再向其他学科发展,即在学好各国语言的情况下,再学习以各国语言讲授的其他学科课程^[6]。因此,洋务学堂的外语与内容的融合学习经历了从以“外语为中心的教学法”(language-oriented approach)到“辅助教学模式”(adjunct model)的过程^[4]。

3.2 教学资料

如上文,Leaver和Stryker总结的CBI四个特征之一是启用地道的外语教材。洋务学堂中的部分教材是由外籍人士从美、英、法等国直接引入,也有教材是由精通专业内容、汉语和外语的教师编写或者根据原版教材翻译的。如成立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其用于高中、大学阶段教育的所有教学材料,包括参考文献,都是从美国引进的^[3];京师同文馆的八年制西学课程的教科书也有使用原版外文教材。可见“运用地道教材”这一CBI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3.3 教学主体

CBI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具备用目标语教授专业知识的能力。而洋务学堂教师普遍由外国人担任。据统计,京师同文馆先后有51名外籍教师来馆任教;福州船政学堂成立后的5年间,也聘请外籍专职教师9名,兼职教师14名^[2]。后洋务派为了增加中国教师,又在各学堂挑选了同时具备语言和专业知识的优秀毕业生担任教师,如汪凤藻、严复等学员都先后留堂任教。因此洋务运动晚期培养了一批既通晓汉语、外语又有专业知识的双语教师,为外语教育师资本土化打下了基础^[7]。

3.4 教学对象

具备一定的外语基础是学生适应CBI教学的必要条件。京师同文馆就对年岁较小而且学制较长的学生先进行外语学习,而后再采用外语教授

“西艺”课程。福州电报学堂和天津电报学堂也都要求招收具备英语基础的学生入学。这种外语教学策略是对学生目标语认知水平的尊重,也符合教学实施对学生水平的要求。CBI对于外语水平较弱的学生来说帮助作用不显著,只有学生的二语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使二语学习对其认知发展产生正面效应^[8]。而这种正面效应一旦产生,后续的认知和外语的学习就会水到渠成。

3.5 评价体系

京师同文馆有定期考核,也有外交翻译和中外口译的实践活动。福州船政学堂以船舶车间实习、航海实践为主。这些评价制度都突出了对专业知识的实践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的重视,而这又与CBI蕴含的学习实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CBI对内容学习的考核强调的是在目标语创设的问题情境中,考察学生用目标语分析问题,将概念图式转化为实际操作,从而解决问题的技能,是让学生掌握目标语在本专业中的思维方式^[9]。而洋务学堂对学生的评价即是在目标语问题情境中考察学生的外语技能、操作技能、概念应用的技能。

鉴于上述对洋务学堂中外语课程的相关要素特征的分析表明,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与CBI教学观念体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可以说,洋务时期的外语课程教学便是CBI教学观念的初期实践,而外语教学在洋务教育的开展过程中逐渐建构出了一套CBI教学的原型。

4 洋务学堂外语课程的CBI本质对当今外语教学的启示

回顾洋务教育在外语课程教学的实践过程,我们不得不惊喜于它超越时代的创新性教学方式,纵然当中包含历史使然的客观因素,但其中的闪光点仍可以为当今的外语教学提供思考的方向。

4.1 以洋务教育的贡献看外语学习回归工具性本质的重要性

洋务教育的贡献一方面在于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清末民初的各领域的优秀毕业生。如从京师同文馆毕业的沈铎、张德彝、汪凤藻都分别在政府、外交、教育等部门担任要职。福州船政学堂的优秀毕业生有以翻译家、思想家、教育家为大家熟知的严复;分别担任北洋舰队、经运号与致远舰的将领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刘世昌等人。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的毕业生也成为我国最早

一批的现代通讯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洋务教育对“西艺”的学习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不论是人才培养或是工业技术的现代化,外语教育都至始至终贯穿其中,成为西方近代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输入的媒介。但是,我们的外语教学却长期将外语当成一门学科去学,造成外语技能与专业知识相脱离,忽略了外语作为工具而存在的根本认识。而CBI教学就恰恰强调外语学习回归其工具性本质,让外语成为获取知识和传播思想的载体。

4.2 从质疑看CBI实施的可行性及民族性的保持

时至今日,纵使CBI教学已实践多年,国内对CBI的质疑却仍未散去:反对者一方面认为学生的水平、师资条件、教学材料不能适应CBI;另一方面认为CBI教学涉及教学用语问题,涉及民族问题。针对第一点,从历史上看,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都已体现出CBI的教育观念,那么,现阶段在社会物质条件、师资、学生水平等方面则具备更充分的实行CBI的条件。而对于民族性问题,我们可以借古开今。1871年京师同文馆的奉堂谕曾写道同文馆原为学习洋文,然必通晓汉文者,方能于洋文得力。汉洋自应一体专心分学^[10]⁹⁸⁻²⁶¹,福州船政学堂也要求学生在学习专业课之外得兼习《圣谕广训》《孝经》《策论》等中国传统课程。这体现出洋务学堂在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时,强调对学生母语学习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并重。这对于我们今天外语教育规划中如何处理实施外语教育的同时注重学习母语,保持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7]。因此,在实施CBI的教学中,保留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让学生体会中国外语之优美,中华文化之美好。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是否根深蒂固,民族语言能否延续,靠的是整个民族能否坚定地传承本民族语言和强化民族的话语权,而以摒弃世界所广泛接受的外语来维护本民族外语地位的做法显然不可取也无益。

4.3 从洋务运动的失败看学术输入与输出的同等重要性

在教育目的上,洋务派学习“西文”和“西艺”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这仅仅是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只有西方文化及技术向中国的单向输入,而科技也未真正地融入中国生产生活中。而科技才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科技的落后也注定国家政治地位的落后,这也是我们今天将洋务

运动的政治意义定性为失败的原因之一。而面对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我们应倡导一种互动的、双向的交流。通过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英语与世界交流,我们在汲取国外先进技术与知识的同时也输出自己的新兴技术和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知识无国界”思潮推动下,一方面,我们掌握了世界范围内最前沿的学科信息,以避免错误研究和重复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来展示我们的创新研究成果。在这种国际学术输入与输出的循环运转中,国家的学术话语权才能被人承认。而CBI教学观念所强调的培养学生用目标语进行专业学习的思维方式,能使学生有能力参与到前沿的学术输入与输出中。CBI形式的全英语课程是争夺世界未来人才,扩大我国在国际政治、科技社会上影响力的重要举措^[11]。

鉴于上述分析,洋务学堂的外语课程教学实践早已体现出了CBI教学的雏形。从客观上说,是社会及历史条件制约了洋务学堂对教学模式、教材、师资等教学因素的选择,但也因此促使洋务学堂形成了以外语为媒介来学习专业知识的教学模式,继而培养了一批富有成就的近代化人才。而面对当今的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一个人是否能不受外语的阻碍获取专业的发展动态,并输出自己的学术思想已变得举足轻重,而CBI教学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纵然目前的CBI实践仍面临诸多阻碍,但对比一个半世纪前的实例

后,相信眼前的困难会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 [1] 夏东元. 洋务运动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2] 田正平. 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3] Leaver, B. & S. Stryker. Content - based instruction for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s [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1989. 22(3).
- [4] 都建颖. Content - Based Instruction: 以内容为依托的英语教学法[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 [5] 顾卫星. 京师同文馆英语教学历史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5): 24.
- [6] 陈海燕. 同文馆外语人才培养困境与破解途径的研究[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 [7] 高晓芳, 李开拓. 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教育规划得失谈[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4): 54 - 55.
- [8] 袁平华, 俞理明. 以内容为依托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双月刊)*, 2008(1): 63.
- [9] 陈泽璇.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之基于内容的教学[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0(12): 119.
- [10] 高时良.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 [11] 蔡基刚. 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定位研究[J]. *外国语*, 2012(1): 71 - 73.

Renaissance or Innovation: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Tak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n Westernization Schools as an Example

PENG Shan^a, FANG Zongxiang^b

(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Jinshen College;

b. School of Oversea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foreign language (FL) teaching in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as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official FL teach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el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L teaching in Westernized Schools, this paper reveals its surprising similarities with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 Though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s was politically failed, the FL practice in that period provided enlightenment for today's FL teaching practice.

Key words: Content - Based Instruction;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esternized Schools

(责任校对 蒋云霞)